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系列学术著作

# 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 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

赵宾福 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http://www.sciencep.com)

# 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 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

赵宾福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单个遗址和墓地的分组,到多个遗址和墓地的分段,再到整个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最后到诸多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等几个不同层面的研究入手,分别建立了东北嫩江流域、辽西山地、辽西平原、辽东南部、辽东北部、第二松花江流域、图们江流域等7个自然地理区域内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坐标。经过横向对比和整合研究,划分出了夏至早商、商代晚期、西周至春秋、战国4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以纵横两方面研究为基础,构建了整个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体系;从文化,到文化系,再到文化区,最后到文化带等几个不同层次的研究出发,分别确立了双砣子文化系、马城子文化系、高台山文化系、夏家店下层文化系、小拉哈文化系、兴城文化系等6个文化系统。通过考察不同文化系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进趋势与活动范围的变化,发现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考古文化区,即“系列考古文化区”和“序列考古文化区”。依据自然环境、文化特点、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将夏至战国时期的东北划分成了东西并列的两个文化带,即“大兴安岭—燕山文化带”和“长白山—千山文化带”。两大“文化带”和6个“文化系”的划分,对于进一步揭示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区系与后来形成并见于文献记载的不同人群族团之间的内在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有益的启示作用。

本书适合于从事先秦考古、先秦历史、东北及东北亚考古与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及相关学科大中专院校师生参考阅读。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赵宾福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03-025558-7

I. 中… II. 赵… III. 考古学文化—研究—东北地区—夏代~战国时代 IV. K8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2866号

责任编辑:宋小军/责任校对:陈玉凤

责任印制:赵德静/封面设计:王浩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双青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9年9月第 一 版 开本: B5 (720×1000)

2009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1 3/4 插页: 1

印数: 1—1 500 字数: 390 000

定价: 9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双青〉)

本研究成果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和“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中国边疆史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资助

该成果被评为2008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吉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一等奖

**Study on Archaeological Culture of Xia Dynasty to  
Warring States in Northeast Region of China**

**Zhao Binfu**

**Science Press  
Beijing**

## 序

《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这本著作，是我指导赵宾福教授撰写的博士论文。宾福从我于2000年11月为他定这一论文题目始，至2005年12月止，共计费时五年零一个月，才通过这一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通过答辩后，他又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论著搁置一年半认为无需再修改后，才于2008年3月交付科学出版社出版。

我早就应诺宾福写这一著作的序。为了写这个序，2006年10月我就要宾福写成了这论著的“主要内容和论点”；其次，当我于2008年8月被301医院著名骨科大夫王岩教授作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腰部手术已从医院回到家中仍处于康复期时，我于9月又要宾福写成了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历程提要的材料；再次，是我从科学出版社宋小军手中要来了已经过了三校即将付梓的《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再通读一遍，边读边划出我认为需再斟酌之处，目的是让宾福在这论著付梓之前再做一些哪怕不是重要的修改。我相信宾福看到我划出需再斟酌之处之时，将会再次做一些修改的。这是一本让材料牵着鼻子走，以客观的态度，经长期严肃认真的研究写出来的著作，为这样的著作写序，即使对东北考古已作了半个世纪研究的我来说，也该作这样的准备。

这本著作，是一些朋友协助宾福完成的作品。我审阅这部著作初稿时，也请陈雍、朱延平、乔梁及杨晶参加了审读，并在我的主持下，还约了陈雍、朱延平、乔梁、杨晶和宾福集合于故宫博物院，听取宾福汇报这部著作的初稿，在这个小型讨论会上，每位参加会议的人，都诚恳地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其次，审读这论文的朋友，在肯定这论著的同时，也提出了不少不同的意见。最后，答辩委员会的徐光冀、林云、陈雍、朱泓、滕铭予、朱延平和乔梁诸位委员在答辩过程中提出的富有启发性的质疑及具有指导性的意见，为完善这部论著起了重要作用。在此，我作为宾福的导师对上述诸位朋友致以深切的谢意。

宾福在这本著作的《引言》中说道：“张忠培先生早在1990年召开的‘环渤海考古’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和1996年召开的‘渤海文化

研讨会’上的发言，已经分别就辽宁省（涉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南部）和黑龙江省（涉及吉林省）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分区、编年、谱系等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今天看来仍然是十分正确的宏观认识和整体构想。这是本书在现有材料基础上，对整个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进行更深入探索的理论基础。”我看到这里，心中生起蕴论，引起对往事的回忆。

一是上述两个“发言”，涉及的地域除整个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部外，还包括山东及河北部分地区，年代除先秦外，部分地区还延至魏晋，讨论的问题除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谱系、文化关系及考古学文化族属外，还提及了旧、新石器时代渔猎及采集的转化和此种经济转化为牧业经济，以及渔猎、采集与农业两类新石器时代文化及农业、牧业两类文明的问题，此外，对生业、制陶、金属制造以及文明进程诸问题，也做了一些讨论，这两个《发言》涉及的问题尽管广泛，但仅是提纲性的论证。

二是正如我在《黑龙江考古学的几个问题的讨论》这一1996年“渤海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所说的那样，1975年我带学生赴荆州纪南城实习途经北京听了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演讲之后，便开始思考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问题。1977年，李木庚将我从基教工作（我于1976年被派出参加吉林省基教，是有关方面对我抵制“批三株大毒草”所进行的惩罚）中调了出来，到他主持的黑龙江东宁团结遗址工地，要我负责编写提交国家文物局将在哈尔滨召开“边疆考古工作”会议的材料。期间，除完成木庚交代的这一任务外，还作了如下两件事：

其一，主持了东宁团结遗址发掘资料的整理工作，将这遗址此次被揭示出来的遗存，分为年代先后的两类，即团结文化和靺鞨文化，又将靺鞨文化区分为先渤海国时期和渤海国时期，并对团结文化和渤海国时期的靺鞨文化进行了分期，还将团结文化的族属归之于沃沮，并提出了渤海国文化可能存在着城乡即贵族与平民之差别这样的考虑。此报告的编写工作由陈雍和魏存成分担。遗憾的是，至今仍未见报告问世。

其二，是在哈尔滨应黑龙江省博物馆之邀作了一次演讲，讲的就是东北地区考古的区、系、类型问题。我这次演讲将东北考古遗址分

为西拉木伦河流域、嫩江流域、牡丹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吉长地区、沈阳地区、辽东半岛和图们江流域，又将这8个地区分为三大系统，即认为哈尔滨至沈阳铁路沿线是将东北区分为面向亚洲腹地和海洋这两大系统的中间地带。

这是继苏秉琦之后，用苏秉琦开创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第二次观察中国考古学遗存，当然，对东北地区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三是1979年后，我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教学与科研的重点转移到了关内，但对东北的关注未减：

其一，是将本科生的毕业实习安排在东北和撰写有关东北考古的毕业论文，以及于1986年将考古专修班的田野考古实习安排为发掘黑龙江肇源白金宝遗址。

其二，是20世纪80年代，我撰写了《夏家店上、下层文化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和陈雍、张文军及孔哲生合作）、《东山嘴祭祀遗址与红山文化社会制度》、《原始农业考古的几个问题》、《张家口地区考古的重要收获》及《论蔚县周以前的古代遗存》。后两文涉及的地域超出了东北地区，但张家口是中国北方和黄河腹地的交接地带，又是西拉木伦河及辽西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延伸地区，也是长城地带东段与其中段分界的东缘。故将这两文列入东北考古。同时，还指导陈光、朱永刚和张星德分别写成了《羊头洼类型研究》、《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初步研究》和《红山文化分期初探》这三篇硕士论文。除这些学术研究之外。我又于1989年秋季至1990年春季期间，参与完成了《中国通史·第二卷》即《远古时代》的编撰工作，在和朱延平共同撰写该书《东北地区》这一章节时，我对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与谱系，作了认真的梳理。

这就是我作《辽宁古遗存的分区、编年及其他——1990年“环渤海地区”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时自己具备的东北考古学研究的前提。

1990年冬于大连参加“环渤海地区”考古学术讨论会的时候，正值我因卷入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而被有关方面停职，勒令反省，接受审查不准离开北京一年之后刚可出北京之际，我利用这一机会，愉快地接受了杨富斗、赵德润和郭大顺的邀请，先后去了山西、河北

及辽宁。对这三位朋友仗义之情，我怀着无限感激，并永远铭记在心。在被有关方面宣布“停职”、勒令“反省”、接受“审查”始，我持的态度就是：“停职”，“审查”是有关方面的事，至于“反省”，“吾日三省吾身”，反省是有的，但无按有关方面规定的方向进行反省的打算，于是便规划起今后要做的事。所规划的工作，无非是还清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即《远古时代》以及我曾经参与主持及主持的几项考古工作的考古报告债。在这个规划之中，除《中国通史·第二卷》即《远古时代》里的东北地区章节及白金宝报告外，主要是东北地区以外的考古研究工作。同时，考虑到白金宝报告因涉及单位人事间矛盾，便安排在这规划的后头。我何时再能回头研究东北啊！则是我参加“环渤海地区”考古学术讨论会的心态。

四是在难以回头研究东北考古的情况下，我做了如下三件事：

其一，是自1992年起，支持杨志军主持黑龙江省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考古调查与勘测的工作。

其二，是自1996年起，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合组国家文物局赤峰考古队，支持朱延平等朋友于内蒙古赤峰市的半支箭河进行先秦时期遗址考古调查、勘测及发掘工作。

其三，是自1997年始，指导朱永刚撰写黑龙江省肇源白金宝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我对东北考古，是深有感情的。但此时的我，实无时间亲自从事东北考古研究，自然，也就不敢黏手新的东北考古工作。因为我欠的旧债尚不知何时还了，何敢因为黏手而欠新债呢？袖手旁观吧！活着，不能睁眼见到事业的损失，见到这事业的损失，心情不平，悲痛、愤怒炽热于心，熬不过这至极的痛苦，对深怀感情的东北考古，更是如此。自己不能干，又不能袖手旁观，怎么办？这就是只得找“替身”了，对“替身”予以支持和指导，以抚平自己的心境，寻找乐趣。这就是我于20世纪90年代所以热心于上述几件事的原因，这也是我在“渤海文化研讨会”作《黑龙江考古学的几个问题的讨论》发言时的处境与心态。确切些说，所谓的处境已不是“难以回头”，而是我已不能再搞东北考古了。只能讲讲如冥福所说的“宏观认识和整体构想”这类话，遗憾、失望、悲痛百感交集，寂寞、孤独涌上心头。此

时我能找到知心对话者，找到“替身”，则找到了愉快与欢欣。

东北考古，20世纪6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日本学人的地盘。经过50年代，尤其是60年代前期中国学者的努力，已将日本学人关于东北考古学的一些说法，搞得支离破碎，中国学者收回了日本学人占据的地盘，掌握了东北考古学话语权。“文革”浩劫中断了东北考古，70年代，十年动乱已处于这黑夜的子夜时分，人们冲破这黎明前的黑暗，考古学者恢复了东北考古工作。进入80年代，在苏秉琦亲自推动下，人们高举苏秉琦的“两论”旗帜，东北考古阔步前进。至90年代前期，积累的资料和一些专题研究成果，已为阐释东北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与文化谱系奠定了雄厚基础，同时，为窥探“两类新石器”和“两类文明”开启了一扇小窗。

先秦时期的中国东北考古学可分为两段，一为新石器时代，一为夏至战国时期。关于新石器时代，我和朱延平合著的《中国通史·第二卷》，即《远古时代》中的《东北地区》，对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与文化谱系，生业与经济以及社会组织结构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提出的认识，虽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却具备一定的体系性。从1997年起，我就想搞出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东北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以实现我于1961年初到吉林大学任教时设定的参与中国学者为建设中国东北考古学体系贡献一份力量的追求。如上所述，时至今日，我自己已无力从事这类事情，只能找“替身”代做了。在我心目中，能成为做这事的“替身”者，计算起来，包括宾福在内，实不超出五人。2000年9月，宾福成了我的博士研究生，11月就和他讨论，定下这一论文题目，除了却我的夙愿外，更重要的是想将他再次推入学术前沿。

我将这一琢磨已久而无力亲自完成的《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课题，交给宾福之时，虽信任他会完成的，但由于这课题很大，会完成得怎么样，是否能达到我的预期，我是有点保留的。然而，当他确立了写作提纲以及在写作过程中和我多次交换意见之后，我的这点“保留”渐渐消融，至看完他交出准备答辩的稿子后，我发觉这结果已超出了我的预期，兴奋从内心深处油然而生，喜出望外，认为这一《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著作，是宾福在总结以往有关这一研究领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的

基础上,经过自己严谨、认真而深入的探索,为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构建出了一个新的学术体系,搭建了一座新的研究平台。至此,以往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已在这平台的下方,新的有关这一课题的探索,只能从这平台上起步。简单言之,这部著作在中国东北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的进程中,具有时段性的意义,是一部继往开来的著作。除此之外,我还想着重地作以下说明。

一是这部著作依据自然地理与考古学研究的人文地理,在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据自己的研究,将东北分为七区。按区,按学界已共识的,和少数依据自己对考古学遗存的考古学文化的聚类与分类的理解所识别出来的考古学文化或“遗存”,对它们的期别、文化谱系与文化谱系关系诸方面的问题,作了深入的解析,提出了不少新的认识或新的论点,现就我较感兴趣的撮举如下:

其一,嫩江流域的小拉哈文化,是宾福主持小拉哈遗址发掘之时,新确认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在这本著作中,宾福将古城遗址 H3 为代表的遗存,称之为“古城遗存”,同时,把以二克浅墓地为代表的遗存和以平洋墓地为代表的遗存分别归入白金宝文化和汉书二期文化,并对小拉哈文化、白金宝文化和汉书二期文化进行了分期,指出小拉哈文化、“古城遗存”、白金宝文化和汉书二期文化是嫩江流域同谱系文化先后发展起来的不同演进阶段。在此,我需指出的是,小拉哈文化和“古城遗存”之间,仍存在较大的缺环。这一缺环只能在嫩江流域寻找,未来的考古工作,定将在嫩江流域找到这一缺环。

其二,在我以往划分“辽西”、“辽中”和“辽东”三区的基础上作了修正,将辽河为轴心的地域,划分为辽西山地地区、辽西平原地区、辽东南部区和辽东北部区。同时,以商周分界,自西周始,又将上述地区做了改动,即将辽西山地地区分为西区、东区,将辽东南部区和辽东北部区合并为辽东地区。这较贴近当时人文地理情况。

其三,在辽西山地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方面,首先是将“凌河遗存”区分为西周至春秋和战国早、中期的先后两个阶段,并对以往关于“凌河遗存”所含的曲刃青铜短剑演变的排序研究进行了检讨,提出了自己的编序意见。其次,是把“铁匠沟遗存”和“井沟子遗存”归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暂称之为“井沟子遗存”,并将其视为和“凌河遗存晚期”、“水泉遗存”及“五道河子遗存”同时的遗存。

再次，是指出夏家店上层文化和“井沟子遗存”及“水泉遗存”分布于辽西山地地区的西区，而“凌河遗存”和“五道河子遗存”则占据着辽西山地地区的东区。

其四，在辽西平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上，则是确认了“平安堡二期遗存”是高台山文化的前身和完善了高台山文化的分期。

其五，对辽东北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方面，是将以往学界辨识出来的“新乐上层文化”、“顺山屯类型”、“湾柳遗存”及“望花遗存”均归入“马城子文化”，同时，分别讨论了马城子文化遗址和墓葬分段，然后通过遗址和墓葬分段的比较，进而将马城子文化分为两期。

其六，是认为双砣子一、二、三期文化是分布于辽东南部区同一文化谱系依序演变的三种考古学文化，当从双砣子三期文化发展出来的双房文化兴起之时，便取代了马城子文化，占据了整个辽东区，被从辽东北部区挤出的马城子文化，则迁徙到了第二松花江流域，演变为西团山文化。其次，将双房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同时，以陶器分期排序为基础，和依据同陶器的共存关系，对曲刃柱脊短剑、方釜斧及曲刃矛的形态演变进行了型式划分，将这些不同型式的青铜器分别编入西周、春秋与战国三个时期。

其七，关于第二松花江流域和图们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研究方面，首先，是依据永吉杨屯大海猛遗址发掘出来的遗存的层位关系，并参照马城子文化、双房文化及汉书二期文化的有关器物演变序列，将西团山文化的墓葬与遗址区分开来，对它们出土的器物，特别是墓葬中随葬的陶壶进行了类、型、式的划分与分组，并在此基础上，将西团山文化分为西周、春秋和战国三期。其次，是将图们江夏至战国时期遗存区分为兴城文化和柳庭洞文化，对它们进行了分期、分段研究，认为兴城文化早、晚两期和柳庭洞文化早、晚两期分别位于夏至早商、商代晚期、西周至春秋和战国时期，并认为柳庭洞文化是团结文化的前身。

二是这部著作在分别对嫩江流域、辽西山地地区、辽西平原地区、辽东南部地区、辽东北部地区、第二松花江流域和图们江流域七区作了具体、细致、深入的研究，与得出认识的基础上，进而进行了综合和进一步的解析，从而将自己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对此，我尤感兴趣，现作如下的撮举：

其一，是分区，据表一一可知，或分为七区，或分为八区，或分为六区。从整体看是分为七区。所谓八区，是指将其中的辽西山地地区分为西区和东区。从年代段来看，以商代为界，均只有六区。自商代晚期以前，为嫩江流域、辽西山地地区、辽西平原地区、辽东北部区、辽东南部区和图们江流域六区；从西周始，则是嫩江流域、辽西山地西区、辽西山地东区、辽东地区、第二松花江流域和图们江流域这六区。在这些区域序列考古学文化与“遗存”，或考古学文化分期与“遗存”编年研究的基础上，又从同一地区不同谱系考古学文化出现的时序更替、同一地区同一谱系诸考古学文化的时序演变和同一考古学文化于时序上呈现出的重大质变角度观察综合考虑，将所有地区全部考古学文化（或其期别）和“遗存”分为夏至早商、商代晚期、西周至春秋和战国四个时期，排定出如表一一所说明的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

其二，从文化谱系观察考古学文化序列，识别出小拉哈文化系（小拉哈文化→“古城遗存”→白金宝文化→汉书二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系（夏家店下层文化→塔照一期、二期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高台山文化系（“平安堡二期遗存”→高台山文化→夏家上层文化）、双砣子文化系（双砣子一期文化→双砣子二期文化→双砣子三期文化→双房文化）、马城子文化系（马城子文化→西团山文化）和兴城文化系（兴城文化→柳庭洞文化）等六个文化系（参见表一二）。这六个文化系中的任一文化系，均包含数量不等的同一谱系时序演进的考古学文化。宾福所说的这等文化系，在我看来，可称之为亲族考古学文化系；从地域观察，宾福据同一谱系时序演进的考古学文化是否出现地域变动，将其分为两种发展格局，未出现地域变动者，称之为“一地式连续发展”，出现地域变动者，则称之为“异地式互动发展”。因为存在着这两种发展格局，自然就出现了“两类文化区”，宾福分别称之为“系列考古文化区”和“序列考古文化区”。前者的“系列”，也当有“序列”的含义，不过这“序列”是指亲族考古学文化系的“序列”。后者的“序列”，则是指非亲族考古学文化于一地域出现的时序更替所形成的“序列”。因此，也可将“系列考古文化区”和“序列考古文化区”，分别称之为“亲族考古学文化区”和“非亲族考古学文化区”。同时，应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亲族考古学文

化区”与“非亲族考古学文化区”的涵义，和以往我提出的“亲族文化区”与“历史—文化区”仍有些区别。继提出六个“亲族考古学文化系”、“两种文化发展格局”及“两类文化区”之后，宾福进而提出了夏至战国时期的中国东北地区可划分为“两大文化带”的主张。

这就是《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这是赵宾福的著作，然而，当我逐章地将这著作往下阅读时，苏秉琦却从这著作中显现出来，至读完这本著作，苏秉琦的高大形象就清晰地屹立在我的眼前。我所以从宾福这本著作中看到苏秉琦，是因为这著作从微观到宏观，从具象到抽象，从形而下到形而上，无不贯彻着苏秉琦考古文化区、系、类型论即考古学文化谱系论。这是一本将苏秉琦考古学文化谱系论结合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实际，既从形而下，又入形而上进行了细致、认真、深入解析产生的一本专著。从《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地区及年代范畴来看，在该著作所涉及的领域中，这是第一本著作。从体现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即考古学文化谱系论的规模和完整性观之，这是中国的第一本著作。

当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任何优秀的著作也不能不存着可待商榷、补充和完善之处。我看完这本著作，也觉得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现摘要讨论如下。

一是关于魏营子文化和“凌河遗存”的文化谱系的归属问题。我认为应将魏营子文化归入高台山文化晚期，“凌河遗存”则应纳入双房文化，如是，辽西平原地区的相当部分，当属双房文化分布区，尽管在这地区目前尚未发现双房文化遗存，但我估计将来的考古工作定会见到这种遗存的。至于魏营子文化和高台山文化晚期，以及双房文化和“凌河遗存”于文化面貌上所显示的区别，仅可能是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类型的差异。

二是文化的“传承、吸收、融合、创新”是考古学文化演进规律。宾福在讨论同一谱系时序演进的诸考古文化更替，以及不同谱系共时的诸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关系时，虽注意这一演进规律的某些方面，但从总体上来看，则尚未深入到这一层面。

三是年代问题上，其一，目前学界基本共识的意见是将夏代起止

年代定于公元前 21 世纪到公元前 17 世纪，同时认为二里头文化并非夏代最早的夏文化。这本著作对此注意不够，有时将与二里头文化同时的遗存，视为夏代最早的遗存；其二，所谓商代早期，考古学界共识的意见是包括二里冈下层文化和二里冈上层文化先后两个时期，宾福在讨论文化或文化期别编年时，对此注意不够。首先，是缺乏标年器物的类比。其次，未能明确涉及所说的商代早期是指二里冈下层文化时期，还是二里冈上层文化时期；再次，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没有充分注意“夏至早商”和“商代晚期”于某些地区同一谱系时序的考古学文化之间，和不同谱系时序更替的考古学文化之间实际存在的年代空隙。

我提出的上述讨论，也是我对今后东北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希望。企盼在继续深入探索与完善东北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同时，对夏至战国时期农牧两类文明、经济结构以及社会组织与结构的考古学研究的进步，我寄予更多的憧憬。

張忠培

2009 年 2 月 23 日 17 时写于小石桥

# 目 录

|                             |         |
|-----------------------------|---------|
| 序 .....                     | 张忠培 (i) |
| 引言 .....                    | (1)     |
| 第一章 嫩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编年 .....   | (3)     |
| 第一节 白金宝遗址四种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区分 ..... | (6)     |
| 一、1974 年第一次发掘材料的再认识 .....   | (6)     |
| 二、1979 年复查材料的再认识 .....      | (8)     |
| 三、1986 年第三次发掘材料的再认识 .....   | (9)     |
| 四、四种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区分 .....        | (13)    |
| 第二节 小拉哈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15)    |
| 一、材料确认 .....                | (15)    |
| 二、分期研究 .....                | (18)    |
| 三、年代判定 .....                | (23)    |
| 第三节 “古城遗存”的辨识与年代 .....      | (23)    |
| 一、文化辨识 .....                | (24)    |
| 二、年代判定 .....                | (26)    |
| 第四节 白金宝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26)    |
| 一、遗址材料分析 .....              | (27)    |
| 二、墓葬材料分析 .....              | (35)    |
| 三、文化分期与年代 .....             | (43)    |
| 第五节 汉书二期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46)    |
| 一、遗址材料分析 .....              | (46)    |
| 二、墓葬材料分析 .....              | (53)    |
| 三、文化分期与年代 .....             | (63)    |
| 第六节 嫩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编年坐标的确立 .....  | (66)    |
| 第二章 辽西山地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编年 ..... | (67)    |
| 第一节 地理范围与研究现状 .....         | (67)    |
| 第二节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内涵、分期与年代 .....  | (68)    |
| 一、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和内涵问题 .....   | (69)    |
| 二、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期与年代问题 .....   | (70)    |
| 第三节 魏营子文化的内涵与年代 .....       | (73)    |

|                                                       |       |
|-------------------------------------------------------|-------|
| 第四节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80)  |
| 一、文化分期 .....                                          | (80)  |
| 二、年代讨论 .....                                          | (86)  |
| 第五节 “凌河遗存”的内涵、分期与年代 .....                             | (90)  |
| 一、关于文化内涵(材料)的两点说明 .....                               | (90)  |
| 二、关于分期和年代问题的再认识 .....                                 | (91)  |
| 第六节 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后至战国燕文化之前的几种文化遗存 .....                    | (97)  |
| 一、“水泉遗存”的特征与年代 .....                                  | (97)  |
| 二、“井沟子遗存”(含“铁匠沟遗存”)的特征与年代 .....                       | (99)  |
| 三、“五道河子遗存”的特点与年代 .....                                | (102) |
| 第七节 战国燕文化遗存 .....                                     | (102) |
| 第八节 辽西山地地区考古学文化编年坐标的确立 .....                          | (103) |
| 第三章 辽西平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编年 .....                           | (105) |
| 第一节 “平安堡二期遗存”的特征与年代 .....                             | (105) |
| 一、文化特征 .....                                          | (105) |
| 二、年代判定 .....                                          | (106) |
| 第二节 高台山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108) |
| 一、遗址材料分析 .....                                        | (110) |
| 二、墓葬材料分析 .....                                        | (111) |
| 三、文化分期与年代 .....                                       | (116) |
| 第三节 辽西平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编年坐标的确立 .....                          | (119) |
| 第四章 辽东南部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编年 .....                           | (120) |
| 第一节 关于双砬子一、二期文化的几个问题 .....                            | (121) |
| 一、老铁山积石墓应该是双砬子一期文化的墓葬 .....                           | (121) |
| 二、双砬子一期文化应该是处于夏代初始阶段的青铜文化 .....                       | (124) |
| 三、双砬子二期文化是夏代早期至商代早期受过山东半岛岳石文化<br>强烈影响的一支地方性土著文化 ..... | (125) |
| 第二节 双砬子三期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130) |
| 一、遗址材料分析 .....                                        | (130) |
| 二、墓葬材料分析 .....                                        | (145) |
| 三、文化分期与年代 .....                                       | (156) |
| 第三节 双房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                                  | (158) |
| 一、遗存确认与文化特征 .....                                     | (158) |
| 二、材料特点与研究思路 .....                                     | (161) |
| 三、陶器的类型学研究与分期 .....                                   | (162) |